

# 我们的父亲陈芳允和母亲沈淑敏

陈晓东(执笔) 陈金凤



陈芳允  
(1916~2000)

无线电电子学与空间系统专家。浙江黄岩人,1916年4月3日出生,2000年4月29日去世。193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解放军总装备部科技委顾问、研究员。为我国无线电电子学做了开创性工作。1999年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1980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父亲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我国863计划的发起者。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教育着我,这种身教重于言传的方式影响了我,并使我一生受益。父亲告诉我,作为一个从事科学研究的科学工作者最重要的有三点,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有爱国之心,这是一切科学研究根本,科学无国界,但从事科学研究的人是有祖国的,心中要有国家,这是科学工作者最需要明确的。在父亲的教诲下,我毕生为了国家的富强和发展,献身微电子行业。第二点是要努力工作,父亲一生兢兢业业,鞠躬尽瘁,献身科学的敬业精神不断激励着我奋发向上。第三点是淡泊名利,父亲从不追名逐利,一生只在他从事的领域执着地追求新的突破,这种精神也深深感染着我。父亲教导我不要跟在外国人后面一步一步爬行,亦步亦趋,要改变观念,要创新,跨越式发展。我从事集成电路设计工作,遵从父亲的教诲,

每一个五年计划就跃上一个数量级，集成度从千门、万门、几十万门到几百万门，大幅度跨越，达到了国际水平。

2009年，我们读到一篇关于原清华大学物理学教授叶企孙先生的文章，读后非常感动。沉寂了几十年之久的叶教授终于浮出水面，终于有人公开主持公道为其鸣不平。可以说没有叶教授，哪有清华物理系的辉煌，哪有“两弹一星”的功臣？作为小辈，我们穷词难表。但若我们父亲地下有知，也会感到欣慰。那是在“文化大革命”血雨腥风的1967年，父亲特地让我陪他一起在一个晚上去看望了叶企孙教授一次，那时还是要冒着极大风险的。父亲为了不影响到别人，所以特地让我陪他去。叶教授终身未娶，没有子女，虽说桃李满天下，却都自顾不暇。晚年逢“文化大革命”倍受折磨贫病交集，很是凄凉。他可是一代以身许国之知识分子典范啊。看完恩师回来，心情不免沉重，但也无奈。连我那1974年才嫁进门的媳妇也知道这事，同时也感受到我父亲儒雅宽厚和尊师重教的风范。

我父亲不仅对叶教授满怀尊敬，对吴有训教授、严济慈教授、孟昭英教授等原物理系教授也一样尊敬有加，即使在晚年，父亲自己都已经70多岁了，但逢年过节都会尽量抽出时间去看望他们。在他心目中，他们始终是他的老师。如果没有他们当年的教诲以及开放的学术氛围和提供的实验室，并强调动手能力，不可能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这些基础让学生终生受益并为新中国培养了一大批栋梁之材。我们的母亲也是如此，尊师重教。直到晚年，她已经70多岁，还要去看望贝老。并经常念叨大学的一位老师，老师去世以后，对其家庭还资助过一段时间。

父亲一生很节俭。我们经常看到他自己缝补衣物。他还有一手给自己理发的绝活。其实他和母亲两人都已是一、二级教授，在当时工资不低，而且只要了2个孩子。那么他们应该有不少积蓄？但事实不然。多年来，除了双方父母，他们还一直资助几位亲属和故旧；经常帮助单位生活困难同事，甚至在经济上支持年轻人考试和出国留学深造。为社会捐款捐物，我母亲也是一直这么做的。为这，还有些人不理解，在“文革”中还批她搞腐蚀拉拢。而我父亲的工资主要花哪儿去了，拿回家的钱很少，我母亲也一直不过

问。当然我们更不知道具体数目，只是隐约知道一些。还有些是父母去世后从别人口里知道的。有一次我们回浙江老家，很过意不去老家的亲戚对我们特别客气，因为我们毕竟是一般的知识分子家庭。后来他们告诉我们当年父亲对他们的资助，及老家爷爷遗留下的一些家产，父亲也全部放弃。在父亲的葬礼上我们曾看见2个学生模样的人尾随在吊唁队伍最后，在父亲的遗像前深深地三鞠躬，然后就走了，没有和我们打招呼，估计也是父亲资助过的学生。

母亲对我父亲不仅工作百分百支持，对他的为人也是百分百信任。而父亲对我们母亲也是百分百信任，由母亲处理家里所有事情。科学院建院和建所初期，工作较忙，千头万绪。院里曾有一次住房调整，我们住10号楼，属甲楼。父亲按职务和职称可以搬到13号特楼去，回来和母亲商量，母亲回绝了。因我母亲本身也是研究员，对自己业务抓得也很紧，不想大动干戈。后来甚至带病工作，但从不要父亲担心和请假作陪，她一生坚强。母亲和父亲一样，在名利面前，也比较低调，能让就让，能迁就就迁就。在她身上体现了中国传统妇女和知识女性的双重美德。母亲生前担任生物物理所研究员，中国科大生物物理系副主任，生物物理学会秘书长，后期还帮着建立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生物系，工作繁忙，还包揽了全部家务，让父亲一心扑在工作上。父亲的出色成就与母亲的辛劳是分不开的。母亲1996年去世时，《中国科学报》登载的纪念文章的标题是《春蚕到死丝方尽》。母亲就像一只春蚕破茧，一丝一丝成就了别人，最后遗体还捐献给了医学解剖<sup>①</sup>。父母感情很深。父亲曾经说过，如果没有妈妈的全力支持，他的工作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绩。所以在母亲病重住院期间，父亲几乎每天下班以后都到病房陪母亲坐着待上好长时间。他一辈子考虑的是国家和工作，在母亲最后的岁月里，他才陪着母亲走过与病痛折磨的有限时光。父亲有大爱，爱祖国，爱工作，爱老师，爱学生，给家人的时间有限。尤其在考察和建卫星地面站时，

---

<sup>①</sup> 沈家三杰：哥哥沈福彰，原青岛医学院院长，20世纪80年代遗体捐献。妹妹沈淑瑾，几研所教授，2010年去世后也捐献了遗体。

更是常年在野外。晚年有了小孙女，非常疼爱，但是因为工作繁忙常年不在家。

父母去世之后，除了父亲90年代获得的何梁何利奖金10万元港币未动之外，只有很少的一点存款。剩下的就是工具书、书稿等，没有一样值钱的东西。而家具都很简陋，有的尚是50年代建院时的家具。

在做人方面的风范，父亲母亲确实给我们做了一个好榜样，并影响我们的一生。

我们从小就懂得要靠自己，不依赖父母。改革开放以后，工作种类选择性更多一些。我爱人毅然去了外企工作，从经济上改善了自己。大女儿在国内工作出色；小女儿出国学习都是她自己考托福、GRE出去的，现在已是某公司地区经理。

父亲于2000年去世。2001年，国家天文台将1998年发现的小行星1998CF1(国际编号第10929号)，经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小天体命名委员会批准，命名为陈芳允星。直到2009年，10年后，我完全退休以后，也继承父母低调处事的风格，经和国家天文台协商，不想麻烦原单位和惊动有关部门再举行仪式，而是简单直接取回授予的小行星命名证书和奖牌，珍藏待日后处理。

### 附：我的爱人陈金凤对父母的回忆

我(陈金凤)作为中关村的外来人口，是中关村的儿媳妇。七十年代中期，用现在的话说是一不小心“嫁入豪门”。现在的中关村尚是“博士一抓一大把，硕士遍地开花”，但比起五六十年代的中关村，那还真是小巫见大巫，没成气候。那时在70年代中期，文化大革命余威尚在，我所见到的这批四五十年代回国为了报效祖国，在后来被称之为科学泰斗、大师、学者的人物，一个个在外表看起来非常朴素，但掩盖不住学者的风范：儒雅，厚厚的镜片后面目光睿智、有神、洞悉一切，然而又不失亲切。记得在某天我惊讶地看见钱三强先生背着米袋拐过路旁走在回家的路上；有时见贝时璋先生拄着拐杖在房管所交房租水电费，用生命体现“细胞重组”；当然，13号楼西边配楼

掩映在白杨树下,有时还会隐约传来一阵阵钢琴声,是那么悦耳,绝非一日之功,使我忍不住驻脚静听。啊,在那个只有八个样板戏满天飞的年代,这样的琴声多么难得。据说那是汪德昭先生家。李佩老师(郭永怀夫人)单薄的身躯背着一大书包,里面装满资料,匆匆走过,大约又是去为她的学生授课……严济慈,吴有训等名字在家中,经常会听到,如雷贯耳,可也稀松平常。有一句古话“往来皆鸿儒”,可能就是如此。

耳染目睹,我就在这样的氛围中逐渐成长。在中科院研究所这样人才济济的地方,我就是一无名小卒,但我有幸生活在这样的氛围中,家庭环境促使我必须学习再学习,努力提高自己。加上还年轻,有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所以我也敢于登上讲台,报告我们小组的工作,让人刮目相看。后来跨入外企公司,逐渐地从技术支持,主管,做到经理一职,在业内有一定的知名度,这应和家庭背景有一定的关系吧。

记得我们的第一个孩子,为纪念当时结缘于江西无线电厂,取名“晶晶”。父亲陈芳允给她起的小名就叫“小江西”。我是江西临川人,嫁到他们家,他们没有拿我当外人,甚至还建议给孩子起名小江西作留念。后来才领悟出,父亲的清华老师吴有训先生就是江西高安人,饶毓泰先生是江西临川人,他的外甥丁渝研究员在高能物理所,就住10号楼后面,都熟悉,所以父亲对江西人不陌生。父亲在日常生活中的体现出来的宽容、随和深深影响了我。然而他工作时的严谨和一丝不苟、不可通融又让我们望而却步。